负伤的为什么总是知识人

《负伤的知识人》探讨了民国时期数十位大小不等知识人，至于在书中相关论述引申、旁及的，估计不下几百人。

书名典出书中主人翁之一贾植芳的一篇译作序言，其本意与字面理解有差异。陈远以此评价贾植芳，以为贾植芳那一代民国时期知识人虽说有过辉煌的政治生活，但知识人还是失去了知识人的本质，在政治上用力太多，在学术上用功太少。人生没有涂改液，等到觉悟，除了惋惜，已经不存在任何弥补的可能性。

《负伤的知识人》
作者：陈远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2年2月版
定价：38.00元

□书评人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贾植芳在陈远书《负伤的知识人》中是一个特例。陈远本书中描述的知识人还有很多，老派知识人有王国维、梁启超、柳亚子、于右任、蔡元培等，新派知识人有陈寅恪、赵元任、胡适、梅贻琦、蒋梦麟、丁文江、罗家伦、朱自清、吴宓、顾颉刚、马寅初、费孝通、郑天挺、赵俪生、季羡林、陆平、江隆基、周培源等，介于知识人和行动者之间有黄炎培、梁漱溟、章乃器、傅泾波等，比较纯粹的媒体人有陶菊隐、孙伏园、邵飘萍、史量才、林白水等。此外，陈远还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当今国际学术界大腕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有密切交往，附录了几篇很有意思的对谈。

仔细分析书中的这份名单，他们中有的人比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等，早在1949年前就去世了，此后的恩怨情仇与他们没有多少关系。有的人如胡适、梅贻琦、蒋梦麟、赵元任、罗家伦等，面对1949年政治变局，毫不迟疑离开大陆，寻找新路。他们究竟是否找到新路，过去很长时间引起一些怀疑，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似可定论，不必再疑。他们躲过了自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的所有文化浩劫，他们将自己有限的生命用在了专业领域，取得了骄人成就。他们为中国文明保留了读书种子，为中国文明传承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示范。

以一股正气坦然留在大陆的有黄炎培、梁漱溟、章乃器、陶菊隐、顾颉刚、费孝通、郑天挺等，他们在1949年之前已经名满天下，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介于知识人和政治家之间。但是，他们在1940年中期之后过度介入现实政治，结果没有影响政治，使政治清明，反而被政治所影响，既影响了自己的学术，又伤害了身心。这些知识人的后半生几乎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往事，空耗精力，辜负了前半生的苦读。

这样的结局当然无法预知，一切都在冥冥中任历史摆布。这是一批充满浪漫主义憧憬的知识人。最可怜的就是像贾植芳那些晚年觉悟者，当他们回望毕生追求和走过的路时，无疑充满失落感。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怀疑当初究竟是怎样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陈远在这本书中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人所走过的不同道路有细致分疏和研讨，许多看法令人震惊令人发省。历史学的意义不是后悔这代知识人走过的路，历史学的启迪在于现在知识人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政治与学术，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公共话题与专业领域。

这是一个大题目，无法说一个知识人究竟应该拿出多少精力去关怀现实关怀政治更合适，但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精密化，完全可以相信，新一代知识人一定能够超越政治与学术、终极与现实、公共与专业的二元对立，像历史上比较成功的知识人那样始终让自己一方面处在一个学术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两方兼顾，两方适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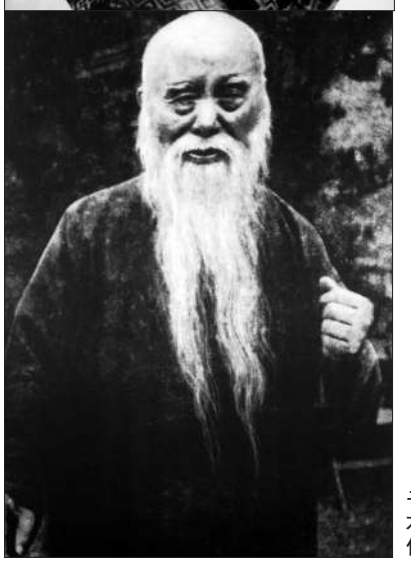
知识人以专业知识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基于学理的分析框架，但知识人一定要弄清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职业。知识人谈论政治与从事政治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知识人一定要时刻警惕自己的政治企图和政治野心，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寂寞和领地。我不能说这些分析就是陈远的结论，但这些看法确实是我阅读《负伤的知识人》的一点心得。陈远为这些“负伤的知识人”深感惋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知识人”，如果从知识人层面去检讨，究竟有哪些教训应该汲取。

王国维

陈寅恪

朱自清

邵飘萍


于右任

鲤鱼洲
平静的回忆

□书评人 牟尼

古汉语专家蒋绍愚、唐作藩先生每人挑100多斤的砖块，现代汉语专家陆俭明在旱地上拉爬犁运稻子，诗人、评论家谢冕领着五六岁的儿子谢悦放牛，语言学家郭锡良赶着大水牛扶犁耕水田，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将二百斤的粮食袋扛起就走……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展现的场景，犹如一个穿越故事。然而，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却是真实的。1969到1971年两年间，北大、清华四千名教职工在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筹建农场，鲤鱼洲也因此出现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回忆中。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下半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等，纷纷响应号召，在全国各地农村创办了“五七干校”，鲤鱼洲自然环境恶劣，是血吸虫病疫区。按照本书多位作者的回忆，选择此地，似有刻意惩罚两校知识分子的意味。然而，迄今为止，由于相关档案尚未公开，这些当年在鲤鱼洲被劳动改造的学者们，尚不知选定此地的具体决策过程，也不知道两年后全部撤回的命令如何下达，是谁的命令。因此，本书所呈现的，是唐作藩、吉常宏、乐黛云、陆俭明、袁良骏等二十多人的个体记忆，而非立体完整的历史重现。尽管如此，编者抢救历史，留存记忆的用心仍值得称许——对亲历者而言，他们见证了这段往事的发生；对后来者而言，他们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又可增加一些历史的追溯，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

既然抱有被“惩戒”的意味，那么被折腾也就不在话下。吉常宏先生回忆，刚到鲤鱼洲不久，大家到大堤上搬毛竹盖房子，一根竹子碗口粗，两丈多长，棒小伙可以扛起来走，他和吴小如先生因体弱，只能拖着走，不料，在场的工宣队员挖苦他们俩，狠狠训了一顿。次日，另一个络腮胡子师傅又来安抚他们。有一天晚上12点（李一华的记忆是两点），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大家手忙脚乱到外面集合，却被宣传队宣布，到校部广场看以前看过不止一次的电影《智取威虎山》。至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则是常事——几乎每位作者的笔下都有类似的记录。

本书大部分篇章，都由陈平原先生约写。正如他所云，本书所收入的散文随笔缺了一点受害者声色俱厉的“我控诉”。在我看来，这一代知识分子自上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太多的社会运动。鲤鱼洲两年虽然辛苦，但更多意义上只是身体的煎熬。相对于某些其他的运动而言尚属“较轻”。让知识分子从事他们所不擅长的体力劳动，在经济上得不偿失，（按黄修己的计算，他们种出来的稻米，成本是每斤五元多，而当时北京市的大米市价，糙米是一斤一毛多，小站米两毛三，面粉一毛八，富强粉两毛五。）在效果上更一无是处。2003年，陆俭明先生曾重返鲤鱼洲，但已找不到自己当年七连的旧址。除了恍若隔世的不真实，他心头的幻灭感也一定很深。

《鲤鱼洲纪事》
陈平原主编
版本：北大出版社
2012年4月版
定价：39.00元

责编 曲飞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赵琳